

郑永年◎著

# 通往大国之路

## 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Tongwang Daguozhilu: Zhongguo De Zhishi Chongjian He Wenming Fuxing

東方出版社

郑永年◎著

# 通往大国之路

## 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Tongwang Daguozhilu: Zhongguo De Zhishi Chongjian He Wenming Fuxing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 郑永年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 10  
ISBN 978-7-5060-5395-2

I. ①通… II. ①郑… III. ①文化传播—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3543 号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TONGWANG DAGUO ZHILU: ZHONGGUO DE ZHISHI CHONGJIAN HE WENMING FUXING)

作 者：郑永年

责任编辑：姬 利 栗河冰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5 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7

字 数：20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5395-2

定 价：42.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9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 出版说明

这个集子收录了过去数年我对中国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的十一篇论文和演讲稿。其中有几篇的部分内容已经出现在作者的《联合早报》专栏上，这次是全文发表。这些文字发表在不同的场合，因为要求不同，篇幅长短也不一。同时本书也收录了六个针对这个主题的访谈录。这次出版，除了改动了个别错别字以外，没有做任何修改。我也注明了每篇文章的发表和写作日期，以反映当时作者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尽管我对历史一直深感兴趣，但我的研究方向并不在文化和文明的领域。不过，这些年来有很多事情迫使我不得不去思考中国的知识体系问题。现实地看，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国门大开，中外之间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但是中国和世界对很多问题的看法分歧却越来越大。一方面，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似乎越来越不了解中国；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也令中国人感到非常不满。很多人都在谴责西方世界的偏见。可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应当是中国人自己的任务，并非西方的责任。正是在这个方面，中国缺少一个能够向外在世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界的各个阶层和群体，尽管对事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一直在借用他人的概念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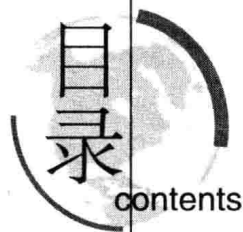
理论来解释自己，结果不但不能解释自己，反而曲解了自己，更不用说希望外在世界来了解自己了。这需要知识分子也即知识的生产者去思考西方的知识体系是如何产生的，我们自己如何能够生产自己的知识体系。从更高层次来说，我在思考中国崛起的时候，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任何一个文明的核心就是知识体系。没有一个强大的知识体系，很难说是一个强大的文明。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复兴的关键就是中国知识体系的创造。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集子就是在早些时候出版的《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的基础上的更进一步的思考。《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关注的是经济、战略和外交的结构性问题，而这个集子关切的则是中国的文化软力量问题。

知识体系的构建和文明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思考和研究。在思考和研究的过程中，作者感觉到有必要把此当成一个长期的事业来做。这次先把一些初步的文字收录在一起，交给读者。

本书的出版要感谢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的总编辑许剑秋先生和栗河冰女士。没有他们的努力，很难这么快就和读者见面。

郑永年

2012年7月



## 出版说明 001

###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都是错的 001

1.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001
2. 西方“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 003
3. “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004
4. 用西方价值观否定中国传统，使中国无法认识自己 006
5. 中国人曲解自己，是中西方相互“误解”的重要原因 007
6. 首要的任务是中国人自己要了解自己 010

### 二、知识体系是最强的软力量 013

1. 没有知识体系，就没有国际话语权 013
2. 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015
3. 中国知识体系的未来：如何开始建设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 019
4. 中国“走出去”的现实途径 023

### 三、知识的力量：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027

1. 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分子可通过创造知识获得权力 027
2. “知识就是力量”：中国知识分子有责任学会解释世界 029
3. 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解释现实的能力 033

4. 中国传统知识体系、知识分子与权力 037

5.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 042

6. 简单的结论 047

#### 四、知识、力量与责任：中国的知识群体向何处去 049

1. 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已进入危机的“百花齐放”时代？ 049

2. 中国社会阶层及其思想状况 051

3. 知识、权力和责任：经验和教训 062

4. 如何建立一个负责任的知识体系 069

#### 五、中国能否为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077

1. 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个文化选择 077

2. 文化创新的三个“解放” 086

3. 新的文化选择 093

#### 六、国际话语权：一种重要的软力量 097

1.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还没有话语权 097

2. 中国必须提升国际话语权 100

3. 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101

4. 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 105

#### 七、中国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

##### ——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社会意识形态 109

1.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110

2. 意识形态何以迅速变革 112

3. 政治秩序不断扩容 114

4. 国家建构与执政党之间的张力 115

5. 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 117

- 八、中国社会到了道德重建的时候了 119
1. 道德解体与中国人的生存危机 119
  2. 道德解体的根源：是市场还是政治 125
  3. 如何重建中国社会道德体系 131
- 九、在“知”和“行”之间：智库的角色 137
1. 政策研究者的“知”与“行” 137
  2. 政策研究者的职责 140
- 十、知识创新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143
1. 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问题 145
  2. 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 151
  3. 高等教育的知识创新体制 155
- 十一、知识体系与中国教育哲学 161
1. 为什么要谈教育哲学问题 161
  2. 中国教育界和知识界：除了专业主义，什么都不缺 164
  3. 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与知识创新 167
  4. 中国近现代教育哲学 174
  5. 教育哲学的未来——专业主义 176
- 十二、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解释中国而不是改造中国 181
1. 先问“中国从哪里来” 181
  2. “别人有批评我的自由” 183
  3. 解释比改造更重要 184
  4. 最大的敌人是昨天的自己 186
- 十三、与经济相比，当代中国文化其实很苍白 189
1. 当代中国的文化现状 189
  2. 停止对中国模式的好坏之争 190



3. 文化创新要完成三个解放 192
  4. 尝试用“共和国家”去解释中国 193
- 十四、中国从历史到现在，从来不缺少公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 195
1. 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 195
  2. “中国模式”与知识体系 198
- 十五、中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的心太急 201
1. 一个国家的发展，不是靠政治家，而是靠专业人才 204
  2. 新加坡教育系统的主要责任是培养熟练工人 206
  3. 研究中国问题，还是离中国远一点好 207
  4. 我不认同季羨林所讲“21世纪是东方文明的世纪” 208
  5. 乐观看待“后李光耀时代” 210
- 十六、儒学：能成为中国软力量的核心吗 213
1. 儒学与现代国家建设 213
  2. 东亚的儒家特性 216
  3. 文明竞争与儒学的未来 225
- 十七、开放的知识体系与开放的社会
- 郑永年教授访谈录 231
1. 把握好价值与事实之间的关系 232
  2. 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是知识体系封闭的心理根源 236
  3. 社会科学的开放性与知识的创造性 241
  4. 知识上的被殖民与观念更新 247
  5. 克服学术的依附性 250
  6. 地方政府应该在制度创新上更有作为 254
  7. 保卫社会的意义 256
  8. 不是土地的城市化，而应当是人的城市化 260



## 一、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为什么都是错的

### 1. 中国还不能回答“中国是谁”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中国学的发展不能说不快。这些年，西方各国无论是企业界、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越来越注重对中国的研究。一些传统上只侧重于汉学研究的机构和组织也开始强调当代中国的研究，尤其是与政策相关的研究。对传统汉学来说，学者们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古代文明、历史、诗歌和语言，等等。传统汉学因此也被视为是古典文献研究。当代中国学则不一样，它是和当地政府、企业界和学界对当代变动中的中国的兴趣紧密相关，这里更有背后强大的物质利益的驱动。传统汉学是学者们对传统中国的互动，而当代中国学是各方面与变迁中的中国的互动。很简单，只有与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互动，才能理解中国，才能促进各方利益的实现。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有越来越大的动力推动中外中国学的交流。随着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中国有关方面也迫切需要中国的文化“走出



去”，来造就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中国崛起首先是经济上的崛起，而非军事上的崛起。因为经济力量要比军事力量“软”得多，中国的崛起因此可以说是“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但是文化力量远比经济力量来得软，实行文化“走出去”来软化经济力量，这应当是一个有效的策略。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力量往往赋予经济力量一种特殊的意义（meaning）。因此，随着经济的崛起，中国内部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驱动力，希望西方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崛起的意义。于是，各个方面开始努力“走出去”，向西方解释中国。从早期的孔子学院到近来的媒体“走出去”，都是中国追求文化软力量战略的组成部分。

但是，中国学或者理解中国的现状则是令人担忧的。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研究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这是西方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担忧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文化“走出去”努力的结果也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尽管在社会层面，西方和中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经济层面，互相整合性越来越大，但似乎是越来越不了解对方。很多年前（2005年）当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并和法国签订中国购买150架空中客车飞机协议的时候，他就指出过，文化交流要比贸易更重要，并且强调，如果中外贸易代表现在，那么文化交流代表未来。我非常认同这个认识。但是，代表现在的贸易飞速发展，但代表未来的文化交流呢？如果文化交流停滞不前，那么未来肯定会成为问题的。

文化交流当然不是单向面的，它需要各国的共同努力。但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不能光责怪西方人不了解中国，而是应该自己努力提供各种途径让西方来了解中国。但目前的情形是，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是这样，还怎么能要求西方了解中国呢？

## 2. 西方“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

根据我的观察，西方中国研究存在着几个大的障碍。首先是价值观问题。这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的学者都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自己已经接受的或是惯用的价值观念来看待另外一个社会。韦伯（Max Weber）曾经非常强调在认识社会和分析社会时要做到“价值中立”（value-free），但这仅仅是个理想，能做得到的也仅仅是少数几个学者，大部分学者离这个目标很远，更不用说政治人物了。“看着苹果（西方）来认识橘子（中国）”是西方学者的一个普遍趋势。西方学者用苹果来衡量橘子，也希望中国这个橘子能够演变成为苹果。马克思说知识分子的两大任务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很多西方学者来说，他们“认识”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而改造中国则更具有价值观方面的含义。当然，西方人也的确相信，他们是有能力根据他们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的。

这使得学术具有了政治意义。实际上，要“改变中国”几乎是中国和西方开始打交道时西方人就有的信念。西方能够改变中国意味着什么？很简单，就是引导或者迫使中国成为一个符合西方理念的国家。从历史上看，当西方（错误地）感觉到中国正在往西方所想象的方向发展时，就感到高兴，中国和西方的关系也会表现出密切；但当西方感觉到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西方所想象的背道而驰时，就感到悲愤，双边关系也自然转坏。

所以当20世纪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时，西方对中国表现出惊人的友好。当时很多西方人认为改革开放会使得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国家。邓小平几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就很有这方面的味道。但是，当1989年春夏间的政治风波发生时，西方人的“中国梦”很快就破灭了。美国



领导整个西方对中国实行了各方面的制裁，而这些制裁到今天还在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1989年以后，中国和西方的故事，大都是中国主动向西方调整政策。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有起伏，但总体上说是中国有意愿向西方利益作调整。在经济方面，中国加大开放自己的大门，“邀请”西方资本到中国。中国尤其花了很大的精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西方来说具有标志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接受了西方主导的现存国际经济体系。在政治上，尽管中国官方努力抵制西方式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但中国在一些敏感的政治领域（如人权）也表现出了很大的意愿和西方对话，例如接受联合国人权公约。中国向西方调整政策的意愿也促成了西方的对华“接触”政策，就是说，西方配合中国的调整，来促使中国更快地朝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很多西方政治领袖坚定地相信他们所谓的“中国的权威主义政治”会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而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隐含在西方人“改变中国”信念背后是一个坚强的道德判断，那就是认为西方代表着现代历史唯一正确的方向。中国只有接受西方的引导才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西方的信念符合其文化价值和国家利益，在这个信念主导下，西方很难意识到其在认识和理解中国过程中有需要做到“价值中立”，更不用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中国。

### 3. “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

西方认识中国的第二个瓶颈是方法论问题。尽管西方一些学者的价值观阻碍了他们对中国的客观认识，但主要还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西方学者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分析中国，正如在西方本位价值立场上观察中国一样，也往往产生一种“看着苹果（西方）来论述橘子（中国）”的局

面。到目前为止，大多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用西方产生的科学方法来观察西方社会现象的产物。对很多概念，西方学者之间本身就有很多争论，但鉴于概念出自对西方社会现象的观察，在方法论和其所产生的概念、理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因此总会被人所接受。不过，当这些概念和理论被用于解释中国现象时，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消失了。结果往往是，西方学者在对中国研究过程中批评（或者赞扬）多于解释，只问“为什么”，而不问“是什么”，或者削足适履，或者盲人摸象。

在方法论方面，西方学者还面临一些研究技术问题。一种情况是，一些学者越来越侧重于微观层面，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从知识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看，从微观层面入手更有可能有新的发现。但这种情况往往产生“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的局面，或者中国所说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进而，这样得到的知识也很难应用到其他的时间和空间的社会现象。这些学者通过各种研究调查技术了解到很多细节，但却不了解这些细节和其背景的关系。另一种情况则刚好相反，学者们想通过研究中国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往往是带着既定的一套观念方法，绕开背景资料和历史脉络，寻找到一些可以操作数据和案例（不管是经济数据还是社会数据），用现存的技术来处理。这些学者往往不知道中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背景，没有细节。文章可能做得很好，但不知道文章在讨论哪一个国家的问题。就是说，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消失了，所留下的只是科学。但很显然，离开了你所谈论的“社会”，“科学”也不是科学了。

西方的社会科学这一学科在 18 和 19 世纪的时候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马克思、韦伯、涂尔干（Durkheim）、帕森斯（Parsons）等诸多大师的建构，已经确立了宏观的“大理论”（grand theory）。社会科学家已经把各种制度背景说得很清楚了，并且经

过长时期的争论，人们对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问题的共识和分歧看得比较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学者们转向微观是可以理解的。再者，从制度层面来说，西方国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在细节和规模上或有损益，但总体制度结构和原理相对恒定不变，这也使得西方学者可以在宏观制度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来研究微观的行为。但显然中国并没有这种情形。自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大变动和大转型过程之中，这个过程迄今还没有完成。因此，很多概念和理论放在西方的背景中合情合理，但一旦被机械地搬到中国的情形中，就显得不适宜。

#### 4. 用西方价值观否定中国传统，使中国无法认识自己

要理解中国，中国学者本身应当尽最大的责任。实际上，较之西方学界，中国的研究界存在着更大的问题。其实这其中的很多困难是多数西方学者所不能克服的，但对中国学者来说要克服并不难，问题在于中国学者本身缺少问题意识。

首先是中国学者价值观方面的问题。西方学者认识中国有价值观问题，但很荒唐的是，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动摇。无论是学者还是政治人物，都试图用西方的概念、理论来解释中国现象。这里既表现为学术概念和理论问题，也表现为价值问题。很显然，西方的很多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学习西方成为风潮，并且被视为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学术研究上，抵制西方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正确。这就造成了滥用西方概念和理论随意曲解中国历史事实和现象的后果。结果就是，不是用苹果（西方）来批评橘子（中国），就是把苹果皮硬贴到了橘子上。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从五四运动以来，大多中国学者都说传统中国是“封建专制”。我想，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概念仍然深信不疑。但问题

是，封建专制并不是一个事实。在西方的历史上，封建和专制是两码事。要么封建，要么专制，两者不能生长在一起。封建意味着分权，即西方统一民族国家产生之前的封建制度（封君封臣制）。而专制指的是另外一种国家形态，即高度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在西方，人们很明白从封建到专制的转型过程，指的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形态。但在中国，秦朝之后再也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封建制度了。同样，中国也不存在西方专制政治形态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严格地说，到现在还没有。这里不是要为中国传统的制度作辩护，只是想说明，西方的很多概念说明不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用西方的价值观来否定中国的传统并不能使得我们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反之，它阻碍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

## 5. 中国人曲解自己，是中西方相互“误解”的重要原因

价值观之外，那就是方法论的问题了。中国本身没有社会科学传统，要做研究就不得不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学习西方就是搬用人家的概念和理论，而方法反而在其次。在很大程度上说，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扮演的只是一个西方“代理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所作的和西方学者所作的并没有什么两样，都是把西方概念和理论传播和应用到中国。直到今天，这个传统还是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大面积地西方化、美国化。学习西方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西方的过程。但学习西方并不见得就要照搬西方的思维方式。今天，随便走进哪一个书店，随手翻开一本书，人们可以发现，除了大量的连作者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和消化的西方概念，剩下的极其有限。从前还讲一点“中国化”的口号，现在连这个口号干脆也取消了。很多人是机械搬用。一些人言必称“马克思”，而另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很少有人真正在研究中国，也很少有人在真





正认识中国。

结果怎样呢？学术研究变成了空谈。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左派和自由派之间对政治改革的争论。左派和自由派长期以来对中国政治改革处于无谓的争论之中。尽管两派的观点正好相反，但思路一模一样，即两边针对的都是同样一个“稻草人”。自由派一谈政治改革总是离不开西方式“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他们把西方的制度看成是普世的。他们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就简单以为一旦选择西方道路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或者形象一些说，他们是看着苹果（西方）骂橘子（中国），认为橘子没有救了，只有把橘子变成苹果才好。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就是把“橘子”变成“苹果”（应当指出，他们中的一些也的确真诚相信“橘子”是可以变成“苹果”的）。

左派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立场明确，反对自由派所提倡的一切。一旦谈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就如临大敌。左派从心理上抵触民主，认为民主仅仅属于西方，中国并不需要。他们过分突出中国特色、国情、文化等因素。在他们看来，中国和西方的不同不仅仅是苹果和橘子之间的区别，而是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之间的差异。实际上，左派使用的话语大多也是从西方进口来的，包括新马克思主义。

学者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就类似于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医生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 and 掌握的技术为病人看病。如果医生看不好病，他（她）只能反思自己所学的知识 and 掌握的技术，而不能说病人的病“生错了”。那么看不好“病”怎么办？需要的是修正所学的概念和理论，因为“病”作为一个客观的事物存在着。而对很多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来说，如果他们的理论解释不了现实，就说“现实”错了。这样当然不会促使人们去认识客观现实，增进对客观现实的理解。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产生了很大一批掌握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技术的人才，包括留学途径和中国自己培养的学者。在技